

# 探究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播活动的文化侵略本质 ——基于郭士立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个案研究

方晓恬

**摘要:** 对于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活动, 当下一些研究倾向强调其促进“西学东渐”、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及其在华创办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个案, 对郭士立在华传播活动及创刊内容进行分析, 置于历史背景中考量传教士传播新知背后的动机, 重申传教士报刊的文化侵略本质。

**关键词:** 郭士立;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传播活动; 文化侵略

**作者简介:** 方晓恬, 女, 博士生。(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7) 05-0036-07

1833年8月1日, 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或Charles Gutzlaff, 亦称郭实腊、郭实猎或郭甲利等)在中国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 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评价称,“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 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 或推此为第一种, 因前三种皆发刊于南洋也。”<sup>[1]</sup>《东西洋考》具有创刊时点上的领先地位, 作者郭士立也因复杂的传教、办报经历备受关注, 他在华进行的传播活动, 对传教士报刊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学界关于传教士报刊对中国作用及意义的评价, 不外乎方汉奇提出的三个方面: 一是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二是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三是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up>[2]</sup>笔者以这三种评价为依据, 对学界目前关于传教士报刊的研究进行梳理, 发现较多强调其对中国报业现代化的示范作用和“西学”内容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作用。这样的研究过度强调客观效果, 淡化侵略动机, 忽视了传教士对华传播的初衷和相关政治经济利益, 容易陷入西方国家现代化话语的陷阱中。本文首先对当下多数研究对郭士立的评价进行辨析, 继而通过对《东西洋考》及郭士立日记等史料梳理, 对相关问题进一步透析, 重申传教士在华办报的文化侵略本质。

## 一、关于郭士立三方面评价的辨析

### (一) 个人品行: 慈善行医背后的传教动机

对于郭士立及晚清来华办报传教士们的评价, 很多研究从品行方面入手, 对其赞美。一方面, 强调传教的艰辛。有学者称, 郭士立们“远涉重洋, 不畏艰险, 来到中国这片地上”, 是“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抱着‘向中国人传教’的目的来到中国的”<sup>[3]</sup>。另一方面, 强调施善的热心。有学者称, 有一些传教士诚心诚意来传教和启蒙, 或从事文化慈善事业, 支持中国的社会进步。他们开办了大量慈善医疗事业, 他们“渴望中国蜕变革新的热忱, 却又是西方型的。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 而尽产婆职责的。”<sup>[4]</sup>

以此评价为核心的研究肯定了传教士来华布道的艰辛, 行医问药的善行, 但对于个人品行的过多

强调容易淡化传教士来华的本质目的。在《东西洋考》中，郭士立谈及用医疗手段救助底层中国人，开设医院时，往往借机宣传上帝的仁爱，可见其动机并不纯粹：

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稣之宠祐。<sup>[5]</sup>（道光乙未年六月《广东省城医院》）

清朝“禁教”政策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增加了难度，郭士立在南洋一带寻找进入中国的机会时，就曾探索医务传教的途径。利用西方先进的医疗知识和免费的药品救济穷苦百姓，不仅可以借机宣传宗教的仁爱精神，还可以笼络人心。如上文示例，郭士立始终将“施恩救助”与“耶稣”结合在一起，期待受惠者感恩基督教进而皈依。医务传教表面看来为穷困中国人带来了好处，但其长远目的是使更多中国人信仰基督教，感念西方传教士。郭士立行医得到了基督教组织的资金资助，他在华又不断与鸦片商人、英国侵华军队有关联，故此不应一味借郭士立行医问药和个人努力来淡化传教士的动机。

## （二）业务能力：现代化报刊典范背后的利益关系

与当时官方的邸报不同，传教士报刊将西方报刊的编辑经验和经营方式带入中国，树立了现代化报刊的典范。当下研究从三方面总结了这一贡献：第一，树立新闻业务典范。有学者称，《东西洋考》栏目稳定，卷首有目录，文末有编者按语，写作风格通俗、简短，贴近生活，具有近代报刊的特征，为后来国人办报提供了先例。<sup>[6]</sup>第二，传播新闻自由思想。有学者称，《新闻纸略论》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言论自由”，打破了当时封建中国言论自由的禁忌。像王韬这样中国早期的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传教士报刊的舆论导向作用，才萌生了国人办报的思想，并且提出了“立言”的办报主张。<sup>[7]</sup>第三，介绍报刊经营理念。有学者称，《招签题》是一篇自我推销并筹集办报费用的“广告”，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廉价报纸的经营思路。<sup>[8]</sup>

这三种评价从业务、思想和经营三方面概括了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客观积极影响，为本研究提供了启示。但如果将传教士报刊的知识图谱补充完整，还应透过业务实践层面的启示，触及创刊本质。对于“传教士启发国人自办报刊”这一论点，王韬在《书日人〈隔靴论〉后》曾谈及，外人办报具有文化侵略动机，而非单纯文化交流：

又其论传教于中土也，则曰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今之西人，则又善于攻心者也。盖其为计也，以为用兵争地，其民未附，则虽得之，旋失之，财耗人亡，得不偿失。不如播传其教而隐移夫人心，使疾其君如仇讐，而亲我如父母；忌其吏如蛇蝎，而敬我如神明，然后乘其衅而入焉，则不伤一卒，不费一金，而为我腹心之民，此百世之利也。所谓攻心者如此。<sup>[9]</sup>

此外，对于郭士立业务层面的贡献，除了强调“首创”、“第一”的重要地位，这样几个问题不容忽视：业务、思想和经营层面的“首创”是将西方国家新闻实践经验带入中国，并非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首创”，因此无法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与其他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一样，传教士报刊同样意在将中国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文化中；郭士立们倡导的言论自由并非真正赋予普通人民发言权，而意在为王权统治进行挑战，为西方文化在中国开疆拓土服务；《东西洋考》有六个月的经费来源于鸦片商人，该刊具有为外国商人服务的目的，“广告”专栏的设立除了自筹经费外，还有积极推广港口航运信息、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服务的意图。业务层面启示背后，隐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目的。

## （三）文化传播：文化启蒙背后的“二元对立”

当下很多研究从传教士报刊内容出发，总结其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改变中国“封建落后”状态的贡献：一方面，启蒙国人思想。有学者称，被传教士用作辅助手段的西学传播非但未能使中国人沦为西洋文化的奴隶，相反，启蒙了中国的思想界，适应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从而充当了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不自觉的工具”<sup>[10]</sup>。另一方面，将中国带出“野蛮”状态。有学者称，如果没有

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介绍，一向闭目塞听的中国社会就很难感知西方先进文化的惊雷，还会沉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sup>[10](160)</sup>

这类研究肯定了传教士报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层面发挥的桥梁作用，但这两种评价陷入了西方国家设置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中，对中国“闭关锁国”、“野蛮落后”的描述，是将中国置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的对立面，忽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路径，一味用西方现代化标准评判“先进”与“落后”。《东西洋考》中对各国“人”的描述就存在这样的对立，欧洲人的聪慧勇敢与亚洲人的懒惰奸猾形成对比，忽视了文明的平等性，根本目的在于先破后立，为文化侵略提供合理性。下文将通过理清郭士立进入中国的三个相关问题，进一步管窥他如何以传教、办报为掩护，为西方殖民者服务，分析传播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关联。

## 二、关于郭士立对华传播活动三个问题的探究

### (一) 郭士立的入华经历

郭士立从小丧母，家境贫寒，通过给国王献诗，获得在神学院就读的机会，为传教打下了教育基础。1823年，郭士立加入鹿特丹尼德兰传教会，但他一心渴望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去传教，他曾感叹道：当“我可以接触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我一定要留在宾坦岛的话，心里是痛苦的”<sup>[11]</sup>。郭士立广泛接触英国传教士，他与伦敦布道会的麦都思交好，迎娶了新加坡伦敦会女校的玛丽亚·纽威小姐，他甚至十分渴望为大英帝国去开拓中国传教市场，为此他不惜辞去尼德兰教会职务，独立传教。

由于清朝“禁教”，郭士立无法进入中国，暂时停留在暹罗、新加坡等地，但他从没有放弃去中国传教的梦想，他广泛接触华人，不仅学会了中国官话，甚至会讲广州、福建等方言，为入华做足功课。1831年，一位叫林炯的商人同意带郭士立北上天津，郭士立自此开启了1831至1833年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撰写了日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这三次航海之旅与其说是他为入华传教做的功课，不如说是在为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所做的贸易、军事情报勘察，他也利用这些情报获得了好处。

郭士立搭乘林炯的“顺利号”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航海线一路北上，途经上海、山东等地，到达天津。他一路将伦敦会赠予的药品分发给沿途贫苦民众，借机分发传教小册子，宣传上帝。具有航海知识的郭士立记下了沿途航线和贸易情况。归来后，郭士立演讲发文，证明中国的大门可以打开，这引起了西方宗教界、商界、政界的广泛关注，东印度公司决定雇佣郭士立陪同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再次沿中国海岸线航行，以便查明中国商业开放最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郭士立在日记中阐明了厦门、天津、上海三个口岸开埠通商的可行性：

（厦门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和亚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无论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程度，还是从它所囤积的中国出口货物来看，这里对欧洲的商业企业来说都是最好的港口之一。<sup>[12]</sup>

天津的贸易规模相当庞大。每年有五百多艘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以及交趾支那和暹罗前来。河里挤满了中国帆船，商业交易使这里的景色如此富有活力和动感，以致令我想起了利物浦。天津可以为外国企业提供可观的市场。<sup>[12](218)</sup>

上海贸易活动总是生气勃勃，如果欧洲人被许可进入该埠，贸易额还将大为增加，居住在中国中部的千百万人口消费的外国商品数量是很庞大的。<sup>[12](218)</sup>

此外，郭士立还考察了宁波、福州等城市，大体上都得出了“可以开放”的结论。他通过日记展示自己沿海航行考察到的情况，同时鼓吹打破广州单独通商的限制，要求打通东南和华北各港口与中国进行贸易。这对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好的消息。被郭士立认真“考察”过的港

口，也正好成为鸦片战争后开辟的通商口岸。此外，郭士立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关于中国防务组织、武器、军队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信息，这些情报都为其后英军侵华的作战计划提供了一定依据：

我们巡视了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火药的质量很低，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从部队里升上去的……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sup>[13]</sup>

因为实地考察得来的情报，郭士立受到越来越多商界、政（军）界人士的信任，鸦片贩子查顿曾与他合作，并指示他的船长凡事要与郭士立商量，他在语言及中国文化方面学识渊博，与他合作是符合利益的。郭士立本人也从合作中获益，查顿应允他支付《东西洋考》前六个月的出版费。

郭士立还公开美化殖民行径，以印度为例，鼓吹用欧洲的“先进性”改造中国的“落后性”，对于殖民地承受的伤害绝口不提，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话语掩盖侵略：

如果欧洲人曾经计划征服中国，并把这计划付诸实施，中国还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到悲惨的奴役。看看印度斯坦现在享有的民权和宗教自由，那里在科学上取得的快速进步，以及他们得到的基督教真理，再看看中国；中国！永不进步，总是在倒退，呻吟于专制统治之下，在永远的与世隔绝之中灭亡。<sup>[12] (231)</sup>

## （二）郭士立的在华职务

郭士立不仅在华创刊著书，他还涉足政商界，有过很多在华职务。第一，翻译官。1835年，郭士立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帮助英国商人推销鸦片。鸦片战争期间，郭士立是英国“远征军”的翻译兼向导。鸦片战争后，郭士立参与签订《南京条约》，是英方翻译之一，他还和伯驾共同参与了1844年的《望厦条约》签订活动。特殊的语言天赋和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熟识使郭士立成了英国侵略军眼中出色的中文专家。第二，地方“民政官”。英军在定海建立殖民统治时，他担任定海“民政官”；1841年10月，英军攻占宁波后，他被指派为宁波“民政官”；1842年7月，英军占领镇江后，郭士立又成了镇江“民政官”。这一职务又被中国人称为“伪县令”，任职期间，郭士立暴露了自己伪善的本质，欺压当地百姓，甚至敲诈勒索。第三，香港总督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郭士立分别担任了香港前三任总督璞鼎查、德庇时、文翰的抚华道。“抚华道”的职责类似于秘书，郭士立运用其长期与华人打交道的经验专门管理在港华人事务，办理与中国政府交涉事务，这一官职后来演变为香港政府的华民政务司。

郭士立在华三个主要职务，均由英国人任命，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这些活动完全是站在中国人利益的对立面，相比于他在《东西洋考》中宣传的“仁爱亲善”，形成极大讽刺。

## （三）郭士立的对华传播

郭士立对华传播有一个以著书立说为主的文字播道网络。具体手段包括行医传教的口头传播、散发《基督救世传》《上帝拯救传》《耶稣传》等传教小册子、著书办报。据统计，郭士立有中文著作61本、英文著作9本、德文著作7本、荷兰文著作5本、日文著作2本、暹罗文著作1本。<sup>[14]</sup>1833年，他出版了中文著作《大英国统志》，以两个广东人游历英国回国后讲见闻的形式，介绍英国社会状况；1836年，他在新加坡出版中文小册子《是非略论》，以两个广东人远赴英国谋生为背景，扭转中国人对英国的偏见，宣传西方文明。1833年创办《东西洋考》，被视为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他以“爱汉者”为笔名，分新闻、地理、历史、科技等多方面系统介绍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他还面向西方人出版英文著作。除了《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他还于1834年出版《中国简史》（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于1838年6月在伦敦出版《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这些英文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风俗文化等，他的文字暗示了“中国在衰落”的趋势，一定程度上

为英军侵华提供了情报,增加了信心。郭士立还出版了中国皇帝的个人传记《道光传》(The Life of Taou-kiang, with Memoirs of Peking),对中国的介绍在当时是较为全面的。

分析郭士立的著作可见,面向西方国家时,郭士立使用英语,侧重介绍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贸文化等,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情报需要;在面对中国读者时,郭士立积极迎合中国传统习俗,认真研究儒家文化,汲取其“天下一家”等中国传统思想来破除华人的“蛮夷”印象。在对华传播中以英国为主要宣传对象,全面介绍其政治、经济、科技等,采用两个朋友对谈夸奖英国是他的惯用伎俩。为了宣传西方文明,他不惜臆断事实,在《道光传》中,他将林则徐描述成“这个天朝中第一个对西方国家感兴趣的人”,他将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描绘成“善于思考,讲求实际,为主的福音打开中国大门”的人。<sup>[15]</sup>这样具有偏倚性的书写背后,暗含着郭士立竭力宣传西方文明,希望中国人早日破除“蛮夷”观念,接受殖民的意图。

从郭士立入华前的考察活动、在华所任的政治职务,以及对华传播鲜明的书写框架,可以一定程度管窥郭士立对华传播的复杂动机,对《东西洋考》的内容分析则可以进一步佐证其传播本质。

### 三、从《东西洋考》文本佐证传教士报刊本质

#### (一)《东西洋考》的服务对象

郭士立虽来自普鲁士,但他的在华活动与英国关联较多。他的三任妻子都是英国人,他的著作以宣传英国为主,一生政治职务受聘于英国。这一点从《东西洋考》中也可窥见:

论国之权柄,大有势力,而英吉利国为第一,俄罗斯国为第二,法兰西国为第三焉。<sup>[5](294)</sup>  
(道光丁酉年十一月《法兰西国志略》)

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挡,自操权焉。五爵不悦,争论不止。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sup>[5](186)</sup> (道光乙未年六月《新闻》)

马尼拉京城,为大埔头,乾隆年间,大英国水师提督征服之,大船不进口,只抛锚假港,在城建炮台防口于各地方,有天主堂多……如今诸国之船可进口,不禁戒,晨时鸣钟,为日方许开市肆经营。午鸣钟,为夜闾市,寝闭市肆。<sup>[5](26)</sup> (道光癸巳年八月《吕宋岛等总论》)

设女学馆教之,以乐、唱、画、写、作文、识地理、认文理、可诵史记,必读圣书,知耶稣之道理。<sup>[5](201)</sup> (道光丁酉年二月《侄外奉姑书》)

《东西洋考》看似讲“万国之事”,实则对英国着墨最多。第一例中,郭士立直白地确立了英国在欧洲“国之权柄第一”的地位。在二、三、四例中,郭士立介绍了崇尚“自主之理”的英国公会,英国统治下贸易兴盛的马尼拉,风俗开化、人人平等的英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描述了英国文明的先进性。其中,第三例意在引导读者接受这样的逻辑:只有接受英国水师提督的征服,才能拥有繁盛的贸易场景。第四例描述的“男女平等”的社会风俗,其实是与中国社会的“男尊女卑”形成鲜明对比的,这样的对比有助于先破后立,将殖民接管合法化。

#### (二)《东西洋考》的创刊手段

为了成功地推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郭士立巧妙地采取了一些传播手段。第一,入乡随俗。郭士立不仅本人穿汉服、讲汉语,认郭氏族人为父,他的文字也体现着形式尊重。《东西洋考》文章在体例、形式、措辞上与儒家经典诸多相似,使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阶层具有亲近感。郭士立开篇便引用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来扭转中国人的“蛮夷”观念,还利用百姓熟悉的书信形式作为传播西方文明的载体,《东西洋考》中有很多《子寄父书》《侄外奉姑书》等。形式尊重可以让读者放下戒备,有利于进一步宣传西方文明。

第二,议程设置。《东西洋考》中的新闻存在着明显的议程设置。在报道对象上,《东西洋考》宣

称报道“各国之事”，但欧洲国家出现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报道时，也以欧洲国家作对比，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在报道议题上，《东西洋考》宣称“包罗万象”，但其大部分内容是在宣传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繁盛贸易；在报道倾向上，对欧洲人的报道多为正面形象，政治民主，经贸发达，人民善良、勤劳、勇敢等，非欧洲国家人民则奸懒馋滑，信奉邪教等。这样的具有偏向性的报道数量和主题分布，无形中勾勒了“西强东弱”的世界图景，进而形成“落后国家需要被先进国家接管”的逻辑。

第三，排他利己。为了给基督教的宣传争取足够的空间，郭士立在《东西洋考》中竭力排挤贬低其他宗教：

（佛教）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句无稽之谈，则诱取赏财以图肥己。<sup>[5](65)</sup>（道光癸巳年十二月《暹罗国志略》）

在郭士立看来，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异端邪教”，他借地理专栏讲述各国见闻，实际上却在宣传非基督教信仰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为传播基督教清理障碍。

### （三）《东西洋考》的文本逻辑

《东西洋考》介绍“先进”的西方文明的背后隐含着这样的思路：贬低东方国家——宣传西方文明——使中国人接受“优胜劣汰”。郭士立人为设定一个“落后”与“先进”、“封建”与“文明”二元对立的框架，使中国人逐步相信只有被英国等殖民者接管，才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文明社会”：

耶稣上天之时，门生立之为万世教师，继接奉此职之人，自谦志传教，只留心奖善惩恶，导民归正。<sup>[5](342)</sup>（道光戊戌年三月《教宗地方》）

是以大英设新法度，推产生法计。彼地崇天主教辈，几十万。当东汉年间，救世者之门弟（原文如此——引者注），到省传教，且印度人几万甘服顺其道理矣。<sup>[5](183)</sup>（道光乙未年六月《玛塔喇省》）

惟英人不弃兹业，勉力筑堤防，将火烈山泽而焚之，建砖屋，开街衢，给田与土人，招来益房。如此人烟稠密，户口繁滋。<sup>[5](223)</sup>（道光丁酉年四月《孟买省》）

分析以上三例可见，郭士立贬低佛教、伊斯兰教，却倡导基督教“奖善惩恶，导民归正”；他宣传英国先进的生产方式，认为只有英国的技术经验才能给中国带来良田万顷，“户口繁滋”，暗示中国想要发展，也应该像印度一样接受殖民管理。《东西洋考》自身不言侵略，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使中国人自动臣服于西方的文明，打开国门。

## 四、发现和结论

恽代英对“文化侵略”做过四个方面的论述：“宣传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的迷信，使弱小民族不注意眼前所受切身的痛苦”；“鼓吹帝国主义国家之文明”，使弱小民族“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为文物上邦”；“宣传片面的和平博爱的学说……使弱小民族不反抗他们的压迫蹂躏”；“鼓吹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之德意……使弱小民族发生感激之心，以自甘为永不反叛的臣民”。<sup>[16]</sup>这对于反思传教士对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首先，郭士立在华行医问药、著书立说，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宣传上帝，宗教一直是文化侵略的必备武器。其次，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以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为包装，破除中国人的“蛮夷”观念，解锁文化侵略的第一道屏障。在宣传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辅之以亚洲人的“落后”对比，意图使中国读者逐步接受国家间的“强”“弱”和人种间的“优”“劣”之别，进而接受殖民管理。再次，《东西洋考》开篇宣传“四海皆兄弟”的儒家思想，同时不断宣传耶稣的平等仁爱，造成“众生平等”的假象，随着“平等看待西方人”宣传而来的，是东西方文明上的不平等等级。最后，在《东西洋考》中，英军在印度等地的殖民行为被粉饰成“先进地区改造落后地区”的善举。在郭士立自己的

日记中,更是大肆鼓吹对于“征服亚洲,才能使其摆脱奴役”。这样的逻辑意在使中国人逐步接受“优胜劣汰”的思维,早日接受殖民。

本文期待通过对郭士立及其《东西洋考》的个案透析,反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的动机,重申“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的定论。当下有学者以“文化现象不应与政治经济混为一谈”来驳斥关于传教士报刊的“文化侵略说”,这种研究倾向忽视了隐含在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政治。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单纯看传教士报刊的文本,看到的是中国晚清社会的封建和西方文明的进步,属于只抓住了历史的碎片,忽视了宏观的、长远的时代社会背景。报人的主观思想对报刊的立场和形态有重要影响,对郭士立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一个新闻人物生平的梳理,也涉及看待历史问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只有充分结合时代变迁、报人生平经历,才能深入挖掘报刊隐含的价值取向,剖析权力关系。对于传教士及其报刊的研究,应该更多还原历史文本,从历史背景入手剖析权力关系,这样才能对当下对外传播的实践产生正确的启示。

程曼丽提出新闻史研究的三点启示:由点到面找关联、由表及里找线索、由此及彼找规律。<sup>[17]</sup>由此反观当下,过度强调郭士立们的贡献而忽视其本质上的侵略性,一定程度上是视角的局限和方法论的机械:单纯从传教士报刊文本出发,存在“只看其一,未见其二、其三”的局限,没能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割裂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就会被文化侵略的隐蔽性迷惑,忽视背后潜在的权力关系;以当下“文化交流”视角解读新闻史文本,是一种对历史的生搬硬套,而真正的新闻史研究应该回归当时的社会语境,还原历史真相。

#### 参考文献:

-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7: 4-5.
- [2] 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三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7-59.
- [3] 陈建云.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办报动机辨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4): 119.
- [4] 杨师群. 中国新闻传播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0.
- [5] 爱汉者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M]. 黄时鉴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87.
- [6] 赵晓兰等.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77.
- [7] 韩雪. 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 [J]. 学术探讨, 2011 (7): 328.
- [8] 秦镜. 郭士立传播活动及传播思想初探 [D]. 北京大学, 2010: 32.
- [9] 王韬. 书日人《隔靴论》后 [A]. 王韬. 澁园文录外编 [C].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233-234.
- [10] 程丽红. 文化侵略的工具 文化交流的媒介——论近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0 (6): 160.
- [11] 庄钦永. “无上”文明古国 [M]. 新加坡: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2015: 5.
- [12]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217.
- [13] 龚泽琪, 董连泽. 中国军事经济全史 (上) [M].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9: 539.
- [14] [韩] 李宽淑. 中国基督教史略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144.
- [15] 雷雨田. 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 [M].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 146-147.
- [16] 恽代英.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A]. 恽代英. 恽代英文集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820-824.
- [17] 程曼丽. 《蜜蜂华报》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238-241.

[责任编辑: 赵晓兰]

# **A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Aggres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n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and the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Fang Xiaotian

Regarding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tend to stress the positive role they had in enhanc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in driv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This research carries out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and the content of his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so as to reveal the purpose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spreading knowledge with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mphasizing the cultural aggression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ound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